



PREMIERE PARTIE

FANTINE

I

MONSIEUR MYRIEL

En 1815, monsieur Charles-François-Bienvenu Myriel était évêque de Digne. C'était un vieillard d'environ soixante-quinze ans ; il occupait le siège de Digne depuis 1806.

Quoique ce détail ne touche en aucune manière au fond même de l'histoire, nous nous sommes à raconter, il n'est peut-être pas inutile, ne fût-ce que pour être exact et tout, d'indiquer ici les bruits et les propos qui avaient couru sur son compte au moment où il était arrivé dans le diocèse. Vrai ou faux, ce qu'on dit des hommes tient souvent autant de place dans leur vie et surtout dans leur destinée que ce qu'ils font. Monsieur Myriel était fils d'un conseiller au parlement d'Aix ; noblesse de robe. On contait de lui que son père, avant d'avoir hérité de sa charge, l'avait marié de fort bonne heure, à l'âge de dix ou vingt ans, suivant un usage assez répandu dans les familles parlementaires. Charles Myriel, nonobstant ce mariage, avait, disait-on, beaucoup fait parler de lui par son état bien fait de sa personne, quoique d'assez petite taille, élevé, gracieux, spirituel ; toute la première partie de sa vie avait été donnée au monde aux galanteries. La révolution survint, les événements se précipitèrent, les familles parlementaires décimées, chassées, traquées, se dispersèrent. Monsieur Charles Myriel, dès les premiers jours de la révolution émigra en Italie. Sa femme y mourut d'une maladie de poitrine dont elle était atteinte depuis longtemps. Ils n'avaient point d'enfants. Que se passa-t-il ensuite dans la destinée de monsieur Myriel ? L'éroulèrent de l'ancien régim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la chute de sa propre famille, les tragiques spectacles de la révolution, plus effrayants encore peut-être pour les émigrés qui les voyaient à leur tour, avec le grossissement de l'épouvante, firent-ils germer en lui des idées de renoncement et de solitude ? Fut-il, au milieu d'une de ces distractions et de ces affects qui occupaient sa vie, subitement atteint d'un de ces coups mystérieux de la Providence qui viennent quelquefois renverser, en le frappant au cœur, l'homme que les catastrophes publiques n'ébranleraient pas en le frappant dans son existence et dans sa fortune ? Nul n'aurait pu le dire ; tout ce qu'on savait, c'est que, lorsqu'il revint d'Italie, il était prêt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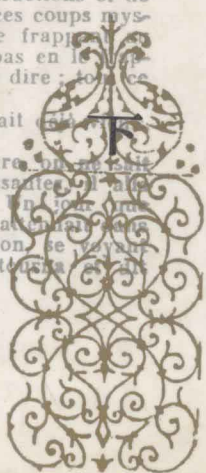
En 1804, monsieur Myriel était curé de B. (Brignolles). Il était curé et vivait dans une retraite profonde.

Vers l'époque du couronnement, une petite affaire de sa cure, bien que plus trop quoi, l'amena à Paris. Entre autres personnes puissantes, il fut sollicité pour ses paroissiens monsieur le cardinal Fesch. Un soir, l'empereur était venu faire visite à son oncle, le digne curé qui attendait dans l'antichambre, se trouva sur le passage de sa majesté. Napoléon se voyant regardé avec une certaine curiosité par ce vieillard, se retournant et le regardant :

— Quel est ce bonhomme qui me regarde ?

悲惨世界

(法) 雨果著



悲惨世界 下

〔法〕雨果著

●

李丹 方于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第 六 卷

小 伽 弗 洛 什

— 风的恶作剧

从一八二三年起，当孟费郇的那个客店渐渐衰败，逐步向……不是向破产的深渊，而是向零星债务丛集的泥潭沉陷下去时，德纳第夫妇又添了两个孩子，全是雄的。这样便成了五个，两个姑娘，三个男孩。够多的了。

最小的两个年纪还很小时，德纳第大娘便把他们打发掉了，她心里还怪高兴的。

说“打发掉”，是对的。这个妇人原只有天性的一个碎片。这种现象的例子不止一个。和拉莫特·乌丹古尔元帅夫人一样，德纳第大娘做母亲只做到她的两个女儿身上为止。她的母爱到此便完了。她对人类的憎恨从她的几个儿子身上开始。在她儿子那边，她的凶狠劲便陡然高耸，在这里她的心有一道阴森的陡壁。我们已经见过她怎样厌恶她的大儿子，对另外两个儿子，她更是恨透了。为什么？因为。这是最可怕的原因和最无可争辩的回答：因为。

“我不想养一大群牛崽。”那个做母亲的常这样说。

我们来谈谈德纳第两口子是怎样摆脱他们对两个小儿子的责任，甚至从中找些好处的。

在前面几页里，我们谈到过一个叫马依的姑娘，曾取得吉诺曼这个老好人的津贴来抚养她的两个儿子，现在涉及到的便是这个妇人。她当时住在则肋斯定河沿，在那条古老的小麝香街转角的地方，那条街已力所能及地把它臭名声变为香气。我们还记得三十五年前那次白喉流行症曾广泛侵袭塞纳沿河岸一

带的地区，当时的科学还利用了这一机会来大规模试验明矾喷雾疗法的效果，这种疗法幸而今天已被外用碘酒所替代。在那次白喉流行期间，马依姑娘在一天里，早上一个，傍晚一个，接连失掉了两个儿子，两个年龄都还很小。这是一个打击。那两个孩子对他们的母亲来说是宝贵的，他们代表每月八十法郎的收入。这八十法郎一向是由吉诺曼先生的年息代理人巴什先生——退職公证人，住在西西里王街——准时如数代付的。两个孩子一死，津贴便没有着落了。马依姑娘便得想办法。她原是那种罪恶的黑社会里的一分子，大家知道一切，并且相互保密，相互支援。马依姑娘急需两个孩子，德纳第妈妈恰有两个。同一性别，同一年龄。对一方来说，是一笔好交易，对另一方来说，是一笔好投资。两个小德纳第便成了两个小马依。马依姑娘离开了则肋斯定河沿，迁到钟锥街去住了。在巴黎，一个人的出身可以由住处换一条街而断绝。

民政机关一点没有发觉，也就无所谓异议，这一偷换行为便毫不费劲地成功了。不过德纳第在出借那两个孩子时，要求每月非分给他十个法郎不可，马依姑娘表示同意，甚至每月到期照付。吉诺曼先生当然继续承担义务。他每六个月来看一次那两个小孩。他没有看出破绽。马依姑娘每次都对他：“先生，他们长得多么像您！”

德纳第不难改名换姓，他趁这机会变成了容德雷特。他的两个女儿和伽弗洛什几乎没有时间来注意他们还有两个小弟弟。（贫苦到了某种程度，人会变成孤魂野鬼，彼此漠不关心，把生人也当成游魂。你的最亲的骨肉也会被你看作是些憧憧往来的黑影，几乎成了人生的穷途末路中一些若有若无的形象，很容易和无形的鬼魂混淆在一起。）

德纳第大娘对她的两个小儿子，原已下定决心永远抛弃不

要了的，可是在把他们交付给马依姑娘的那天晚上，她忽然感到心虚，或是故意装作心虚。她对她的丈夫说：“这可是遗弃孩子哟，这种作法！”德纳第见她心虚，便威严地冷冰冰地安慰她说：“让－雅克·卢梭比我们干得更高明呢！”可是大娘由心虚转到了心慌，她说：“万一警察来找我们的麻烦呢？我们干的这种事，德纳第先生，你说说，是允许的吗？”德纳第回答说：“全是允许的。谁也会认为这是通明透亮的。并且，对这种没有一文钱的孩子，谁也不会感兴趣，要跑来看个清楚。”

马依姑娘是一种作恶的漂亮人物。她爱装饰。她家里的陈设既穷酸又考究，和她同住的是一个有本领的女贼，入了法国籍的英国姑娘。这个取得巴黎户籍的英国姑娘受到人们尊敬，是因为她和一些富人有交往，她同图书馆里的勋章和马尔斯小姐的金刚钻都有密切的关系，日后在一些刑事案件中还很有名。人们称她为“密斯姑娘”。

那两个孩子，归了马依姑娘以后，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在那八十法郎的栽培下，他们和任何有油水可榨的东西一样，是受到照顾的，穿得一点也不坏，吃得一点也不坏，被看待得几乎像两个“小先生”，和假母亲相处得比真母亲还好。马依姑娘装出一副贵妇人的样子，不在他们面前说话。

他们便这样过了几年。德纳第确有先见之明。一天，马依姑娘来付她那十个法郎的月费，他对她说：“应当由‘父亲’来给他们受点教育了。”

那两个可怜的孩子，虽然命薄，总算一向受到相当好的保护，没想到他们忽然一下被抛入了人生，非开始自谋生路不可。

像在德纳第贼窝里进行的那种大规模逮捕，必然还惹出一连串的搜查和拘禁，这对生活在公开社会下的那种丑恶的秘密社会来说，确是一种真正的灾难，这样的风浪常在黑暗世界里造

成各式各样的崩塌。德纳第的灾难引起了马依姑娘的灾难。

一天，在马依姑娘把那张关于卜吕梅街的纸条交给了爱潘妮后不久，忽然有一批警察来到钟锥街，马依姑娘被捕了，密斯姑娘也被捕了，并且那整栋房子里的人，因形迹可疑，都被一网打尽。两个小男孩这时正在一个后院里玩，一点没有看见当时的那种突袭情形。到了他们要回家时，他们发现家里的门已经封了，整栋房子都是空的。对面棚子里的一个补鞋匠把他们找去，把“他们的母亲”留下来的一张纸交给了他们。纸上写的是一个地址：“西西里王街，八号，年息代理人，巴什先生”。棚子里的那个人还对他们说：“你们不再住这儿了。去找这个地方，很近。左边第一条街便是。拿好这张纸，问路去。”

两个孩子走了，大的牵着小的，手里捏着那张引路的纸。当时天气正冷，他的小指头僵了，抓不大稳，没有把那张纸拿好。走到钟锥街转角的地方，一阵风把他手里的纸吹走了，天已经黑下来，孩子没法把它找回来。

他们只好在街上随便流浪。

二 小伽弗洛什沾拿破仑 大帝的光

巴黎的春天常会刮起阵阵峭劲的寒风，它给人们的感受不完全是冷，而是冻，这种风像从关得不严密的门窗缝里吹进暖室的冷空气那样，即使在晴天也能使人愁苦。仿佛冬季的那扇阴惨的门还半开着，风是从那门口吹来的。本世纪欧洲的第一次大流行病便是在一八三二年春天突发的，从没有像那次霜风那

样冷冽刺骨。比起平时冬季的那扇半开的门，那一年的门来得还更冻人些。那简直是一扇墓门。人们感到在那种寒风里有鬼气。

从气象学的角度看，那种冷风的特点是它一点不排除强电压。那一时期经常有雷电交加的大风暴。

有一个晚上，那种冷风正吹得起劲，隆冬仿佛又回了头，资产阶级都重新披上了大氅，小伽弗洛什始终穿着他的那身烂布筋，立在圣热尔韦榆树附近的一家理发店的前面出神，冷得发抖但高高兴兴。他围着一条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拾来的女用羊毛披肩，用来当作围巾。看神气，小伽弗洛什是在一心欣羡一个蜡制的新娘，那蜡人儿敞着胸脯，头上装饰着橙花，在橱窗后面两盏煤油灯间转个不停，对过路的人盈盈微笑；其实，伽弗洛什老望着那家铺子的目的，是想看看有没有办法从柜台上“摸”一块香皂，拿到郊区的一个“理发师”那里去卖一个苏。他是时常依靠这种香皂来吃一顿饭的。对这种工作，他颇有些才干，他说这是“刮那刮胡子人的胡子”。

他一面瞻仰新娘，并一眼又一眼瞟着那块香皂，同时他牙齿缝里还在唠唠叨叨地说：“星期二……不是星期二……是星期二吧？……也许是星期二……对了，是星期二。”

从来不曾有人知道过他这样自问自答究竟是在谈什么。

要是这段独白涉及到他上一次吃饭的日子，他便是三天没有吃饭了，因为那天是星期五。

理发师正在那生着一炉好火的店里为一个主顾刮胡子，他不时扭过头去瞧一下他的敌人，这个冷到哆嗦，两手插在口袋里，脑子里显然是在打坏主意的厚脸皮野孩子。

正当伽弗洛什研究那新娘、那橱窗和那块温莎香皂时，忽然走来另外两个孩子，一高一矮，穿得相当整洁，比他个子还小，看

来一个七岁，一个五岁，羞怯怯地转动门把手，走进那铺子，不知道是在请求什么，也许是在请求布施，低声下气，可怜巴巴的，好像是在哀告而不是请求。他们两个同时说话，话是听不清楚的，因为小的那个的话被抽泣的声音打断了，大的那个又冻到牙床发抖。理发师怒容满面地转过身来，手里捏着剃刀，左手推着大的，一个膝头推着小的，把他们俩一齐推到街上，关上大门，一面说道：

“无缘无故走来害人家受冻！”

那两个孩子，一面往前走，一面哭。同时，天上飘来一片乌云，开始下雨了。

小伽弗洛什从他们后面赶上去，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了，小鬼？”

“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睡觉。”大的那个回答说。

“就为了这？”伽弗洛什说。“可了不得。这也值得哭吗？真是两个傻瓜蛋！”

接着，他又以略带讥笑意味的老大哥派头，怜惜的命令语气和温和的爱护声音说道：

“伢子们，跟我来。”

“是，先生。”大的那个说。

两个孩子便跟着他走，像跟了个大主教似的。他们已经不哭了。

伽弗洛什领着他们朝巴士底广场的方向走上了圣安东尼街。

伽弗洛什一面走，一面向后转过头去对着理发师的铺子狠狠地望了一眼。

“这家伙太没有心肠，老白鱼，”他嘟囔着，“这是个英国佬。”

一个姑娘看见他们三个一串儿地往前走，伽弗洛什领头，她

放声大笑起来。这种笑声对那一伙失了敬意。

“您好，公共车^①小姐。”伽弗洛什对她说。

过了一阵，他又想起那理发师，他说：

“我把那畜生叫错了，他不是白鱼^②，是条蛇。理发师傅，我要去找一个铜匠师傅，装个响铃在你的尾巴上。”

那理发师使他冒火。他在跨过水沟时遇见一个看门婆，她嘴上有胡须，手里拿着扫帚，那模样，够得上到勃罗肯山^③去找浮士德。

“太婶，”他对她说，“您骑着马儿上街来了？”

正说到这里，他又一脚把污水溅在一个过路人的漆皮靴子上。

“小坏蛋！”那过路人怒气冲冲地嚷了起来。

“先生要告状吗？”

“告你！”那过路人说。

“办公时间过了，”伽弗洛什说，“我不受理起诉状了。”

可是，在顺着那条街继续往上去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叫化子，待在一扇大门下冷得发抖，她身上的衣服已短到连膝头也露在外面。那女孩已经太大，不能这样了。年龄的增长常和我们开这种玩笑。恰恰是在赤脚露腿有碍观瞻的时候裙子变短了。

“可怜的姑娘！”伽弗洛什说，“连裤衩也没有一条。接住，把这拿去吧。”

① 公共车，有属于众人的意思。

② 白鱼，古代欧洲的男人留长头发，有钱人还在头发里撒上白粉，认为美观。理发师都这样修饰自己的头发，因此人们戏称理发师为白鱼。

③ 勃罗肯山(Brocken)，在德国，相传是巫女和魔鬼幽会的地方。歌德的《浮士德》中对此有描写。

他一面说，一面把那条暖暖的围在他脖子上的羊毛围巾解下来，披在那女叫化子的冻紫了的瘦肩头上，这样，围巾又成了披肩。

女孩呆瞪瞪地望着他，一声不响，接受了那条披肩。人穷到了某种程度时往往心志沉迷，受苦而不再呻吟，受惠也不再道谢。

这之后：

“噢……！”伽弗洛什说，他抖得比圣马丁更凶，圣马丁至少还留下了他那大氅的一半。^①

他这一噢……那阵大雨，再接再厉，狂倾猛泄下来了。真是恶天不佑善行。

“岂有此理，”伽弗洛什喊着说，“这是什么意思？它又下起来了！慈悲的天主，要是你再下，我便只好退票了。”

他再往前走。

“没有关系，”他一面说，一面对那蜷缩在披肩下的女叫化子望了一眼，“她这一身羽毛还不坏。”

他望了望头上的乌云，喊道：

“着了！”

那两个孩子照着他的脚步紧跟在后面。

他们走过一处有那种厚铁丝网遮护着的橱窗，一望便知道是一家面包铺，因为面包和金子一样，是放在铁栅栏后面的，伽弗洛什转过身来问道：

“我说，伢子们，我们吃了晚饭没有呀？”

“先生，”大的那个回答说，“我们从今天早上起还没有吃过东西。”

^① 相传圣马丁曾把身上的半件衣服让给穷人。

“难道你们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吗？”伽弗洛什一本正经地问。

“请不要乱说，先生，我们有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有时，知道还不如不知道的好。”伽弗洛什意味深长地说。

“我们已经走了两个钟头，”大的那个继续说，“我们在好些墙角旮旯里找过，想找点东西，可什么也没有。”

“我知道，”伽弗洛什说，“狗把所有的东西全吃了。”

沉默了一阵，他接着又说：

“啊！我们丢了我们的作者。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不应当这样，孩子们。把老一辈弄丢了，真是傻。可了不得！我们总得找点吃的。”

此外他并不向他们问底细。没有住处，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

两个孩子里大的那个，几乎一下子便完全回到童年时代那种无忧无虑的状态里，他大声说道：

“想想真是滑稽。妈妈还说过，到了树枝礼拜日那天，还要带我们去找些祝福过的黄杨枝呢。”

“唔。”伽弗洛什回答说。

“妈妈，”大的那个又说，“是个和密斯姑娘同住的夫人。”

“了不起。”伽弗洛什说。

他没有再说下去，他在他那身破烂衣服的各式各样的角落里摸摸找找已经有好一阵了。

最后他终于仰起了头，他那神气，原只想表示满意，而他实际表现的却是极大的兴奋。

“不用愁了，伢子们。瞧这已经够我们三个人吃一顿晚饭的了。”

同时他从身上的一个衣袋里摸出了一个苏来。

那两个孩子还没有来得及表示高兴，他便已推着他们，自己走在他们的背后，把他们一齐推进了面包铺，把手里的那个苏放在柜台上，喊道：

“伙计！五生丁的面包。”

那卖面包的便是店主人，他拿起了一个面包和一把刀。

“切作三块，伙计！”伽弗洛什又说。

他还煞有介事地补上一句：

“我们一共是三个人。”

他看见面包师傅在研究了这三位晚餐客人以后，拿起一个黑面包，他便立即把一个指头深深地塞在自己的鼻孔里，猛吸一口气，仿佛他那大拇指头上捏了一撮弗雷德里克大帝的鼻烟，正对着那面包师傅的脸，粗声大气地冲他说了这么一句：

“Keksekça?”

在我们的读者中，如果有人以为伽弗洛什对面包师傅说的这句话是俄语或波兰语，或是约维斯人和波托古多斯人对着寥寂的江面隔岸相呼的蛮语，我们便应当指出，这不过是他们（我们的读者）每天都在说的一句话，它是“Qu'est-ce que c'est que cela?”^①的一种说法而已。那面包师傅完全听懂了，他回答说：

“怎么！这是面包，极好的二级面包呀。”

“您是说黑炭团吧，”伽弗洛什冷静而傲慢地反驳说，“要白面包，伙计！肥皂洗过的面包！我要请客。”

面包师傅不禁莞尔微笑，他一面拿起一块白面包来切，一面带着怜悯的神情望着他们，这又触犯了伽弗洛什。他说：

“怎么了，面包师傅！您干吗要这样丈量我们啊？”

① 法语：“这是什么？”

其实他们三个连接起来也还不够一脱阿斯。

当面包已经切好，面包师也收下了那个苏，伽弗洛什便对那两个孩子说：

“捅吧。”

那两个小男孩直望着他发愣。

伽弗洛什笑了起来：

“啊！对，不错，小毛头还听不懂，还太小！”

他便改口说：

“吃吧。”

同时他递给他们每人一块面包。

他又想到大的那个似乎更有资格作为他交谈的对象，也应当受到一点特殊的鼓励，使他解除一切顾虑来满足他的食欲，他便拣了最大的一块，递给他，并说道：

“把这拿去塞在你的炮筒里。”

他把三块中最小的一块留给了自己。

这几个可怜的孩子，包括伽弗洛什在内，确是饿惨了。他们大口咬着面包往下咽，现在钱已收过了，面包师傅见他们仍挤在他的铺子里，便显得有些不耐烦。

“我们回到街上去吧。”伽弗洛什说。

他们再朝着巴士底广场那个方向走去。

他们每次打有灯光的店铺门前走过，小的那个总要停下来，把他那用一根绳子拴在脖子上的铅表拿起来看看钟点。

“真是个憨宝。”伽弗洛什说。

说了过后，他又有所感叹似的，从牙缝里说：

“没有关系，要是我有孩子，我一定会拉扯得比这好一些。”

他们已经吃完面包，走到了阴暗的芭蕾舞街的转角处，一望便可以看见位于街底的拉弗尔斯监狱的那个矮而森严的问讯窗

口。

“嗨，是你吗，伽弗洛什？”一个人说。

“哟，是你，巴纳斯山？”伽弗洛什说。

这是刚碰到那野孩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已化了装的巴纳斯山，他戴着一副夹鼻蓝眼镜。伽弗洛什却仍能认出他来。

“坏种！”伽弗洛什接着说，“你披一身麻子膏药颜色的皮，又像医生一样戴副蓝眼镜。你真神气，老实说！”

“嘘，”巴纳斯山说，“声音轻点。”

他急忙把伽弗洛什拖出店铺灯光所能照到的地方。

那两个小孩手牵着手，机械地跟了过去。

他们到了一道大车门的黑圆顶下面，一个人眼望不见，雨也打不着的地方。

“你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吗？”巴纳斯山问。

“去悔不该来修道院^①。”伽弗洛什说。

“烂你的舌头！”

巴纳斯山接着又说：

“我要去找巴伯。”

“啊！”伽弗洛什说，“她叫巴伯。”

巴纳斯山放低了声音。

“不是她，是他。”

“啊，巴伯！”

“对，巴伯。”

“他不是被扣起来了吗？”

“他把扣子解了。”巴纳斯山回答说。

他又急急忙忙告诉那野孩子说，当天早晨，巴伯被押解到刑

^① “悔不该来修道院”，指断头台。

部监狱去时，走到“候审过道”里，他原应往右转，可是他来了个往左转，便溜走了。

伽弗洛什对这种机灵劲儿大为欣赏。

“这老油子！”他说。

巴纳斯山把巴伯越狱的细情又补充说明了几句，最后，他说：

“呵！事情还没有完呢。”

伽弗洛什一面听他谈，一面把巴纳斯山手里的一根手杖取来了，他机械地把那手杖的上半段拔出来，一把尖刀的刀身便露出来了。他赶忙又推进去，说道：

“啊！你还带了一名便衣队。”

巴纳斯山眨了眨眼睛。

“冒失鬼！”伽弗洛什又说，“你还准备和活阎王拚命吗？”

“不知道，”巴纳斯山若无其事地回答说，“身上带根别针总是好的。”

伽弗洛什追问一句：

“你今晚到底要干什么？”

巴纳斯山又放低了声音，随意回答说：

“有事。”

他陡然又改变话题，说：

“我想到一件事！”

“什么事？”

“前几天发生的一桩事。你想想。我遇见一个阔佬。他给了我一顿教训和一个钱包。我把它拿来放在口袋里。一分钟过后，我摸摸口袋，却什么也没有了。”

“只剩下那教训。”伽弗洛什说。

“你呢？”巴纳斯山又说，“你现在去什么地方？”

伽弗洛什指着那两个受他保护的孩子说：

“我带这两个孩子去睡觉。”

“睡觉，去什么地方睡觉？”

“我家里。”

“什么地方，你家里？”

“我家里。”

“你有住处吗？”

“对，我有住处。”

“你的住处在哪儿？”

“象肚子里。”

巴纳斯山生来就不大惊小怪，这回却不免诧异起来：

“象肚子里？”

“一点没错，象肚子里！”伽弗洛什接着说。“Kekçaa？”

这又是一句谁也不写但人人都说的话。它的意思是：“Qu’est-ce que cela a？”（这有什么？）

野孩这一深邃的启发恢复了巴纳斯山的平静心情和健全的理智。他对伽弗洛什的住处似乎有了较好的感情。

“可不是！”他说，“是啊，象肚子……住得还好吗？”

“很好，”伽弗洛什说，“那儿，老实说，舒服透了。那里面，不像桥底下，没有穿堂风。”

“你怎样进去呢？”

“就这么进去。”

“有一个洞吗？”巴纳斯山问。

“当然！但是，千万不能说出去。是在前面两条腿的中间。‘croqueurs’^①都没有看出来。”

① 密探，警察。——原注